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张良林 ● 著

追踪语言符号意义 运行的轨迹

—— 语言符号意义解读模式理论与实践



苏州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张良林 · 著

追踪语言符号意义 运行的轨迹

—— 语言符号意义解读模式理论与实践

追踪语言符号意义解读模式理论与实践

追踪语言符号意义解读模式理论与实践

著 张良林

编 王 伟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邮编：210002）（电话：025-83611111）

（南京）（邮编：210002）（电话：025-83611111）

（南京）（邮编：210002）（电话：025-83611111）

（南京）（邮编：210002）（电话：025-83611111）

（南京）（邮编：210002）（电话：025-83611111）

（南京）（邮编：210002）（电话：025-83611111）

（南京）（邮编：210002）（电话：025-83611111）

（南京）（邮编：210002）（电话：025-83611111）

◆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踪语言符号意义运行的轨迹:语言符号意义解读模式理论与实践/张良林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8.9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ISBN 978-7-81137-150-5

I. 追… II. 张… III. 符号语言(语言学)—研究
IV. H0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8931 号

追踪语言符号意义运行的轨迹

——语言符号意义解读模式理论与实践

张良林 著

责任编辑 王 娅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215021)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地址:常熟市元和路 98 号 邮编:215500)

开本 850mm×1 168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231 千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37-150-5 定价:20.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7258835

前言

本书共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语言符号模式论,主要探讨语言学对于语言符号意义的各种理论的解读,分析对比了主要流派的不同观点,重点考察了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 de Saussure)提出的符号二分模式及语言任意性原则和美国符号学家皮尔士(C. S. Peirce)提出的符号三分模式及其象似性特征;该部分还就由以上两种观点在国内、外引发的争论作了澄清。众所周知,对语言符号意义的解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诸如意义天赋说,意义原子工具论,意义即使用等观点,但经过比较,我们发现索绪尔将语言符号的意义置于符号学框架中的做法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其缺点是:切断了意义的外部来源——人和客观世界;而皮尔士的语言符号模式却具有更大的解释能力,因为纳入了人的因素和外部世界。本部分不局限于探讨前人的语言符号意义模式,还试图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结合当前信息时代知识爆炸性和交际多元性的特点,从语言符号学视野提出语言符号幻象性和模糊性的原创观点。语言符号是人们交流的工具,无法想象没有语言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从某种程度上说,对语言符号意义的探索将直接揭示人类生存的意义。

第二部分为语言符号意义本体论,主要论证语言符号意义的不同来源和意义解读的操作方法。首先,语言形式是语言符号意义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对语言的形式分析可以得出语言的逻辑意义,而语言间相互借词是语言增加语言意义表达手段的重要渠道;其次,语言意义来自于语言使用者的互动和主观经验,人们可以利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也可利用适当的语言来表现其身份、地位及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意义;再次,语言符号的意义还来自于文化,美国语

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提出的语言决定论和相对论虽然夸大了语言对思维和文化的作用,但也说明了语言意义与文化思维之间的密切联系;文化因素诸如人文和科学精神在广告语言中的体现最为明显。同时,意义还来源于人的性别差别,性别意义是女权主义抹不了的心头之恨。语言意义的表达与解读无时无刻不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一方面,不同的语境要求说话者使用不同的话语;另一方面,相同的话语在不同的语境可以解读出不同的意义;当然有的意思,如禁忌是不能直截了当地表达的,这时就必须求助于委婉语了。

第三部分为语言符号意义实践论,主要阐述了如何将语言符号意义理论应用于外语教学和文本符号的意义解读。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环境因素对意义解读具有重要意义,在外语教学中,我们是否可以改善外语教学环境,从而达到提高外语教学效果的目的。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及学习成绩实行大学英语分班教学,改善学生学习外语的认知环境,对于提高犬学生的四、六级通过率具有重要作用。逼真的环境对于施行英语小班教学的中小学生的效果更明显。当然注重环境的改善不能以忽视语言符号形式本身的教学为代价;本部分借用索绪尔开创的结构论探讨了语言篇章特征对英语阅读教学的启示,从而进一步提出注重语言形式在外语教学中的根本性,并以垂悬分词和对一些词语表达法的分析为例证。从语言使用者角度看,认知策略对于语言意义的解读具有重要意义,本部分将以高水平英语听力者的表现为例证。从语言意义的传播者——教师角度看,课堂教学中,身势符号的使用是语言符号的有力补充。本部分还将上文提到的相关语言意义模式应用于文本意义的实际解读,分析了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之所以陷入了意义虚无的困境,是因为其忽视了文本外部环境和人的作用。最后,本书试图克服前人理论中存在的缺点,建立一个全方位的语言符号意义解读模式。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语言符号模式论	(1)
一、语言符号意义理论概述	(1)
(一) 上帝的神话与原子主义	(1)
(二) 经验世界的回归与人的觉醒	(5)
(三) 意义危机	(7)
(四) 新语义研究展望	(8)
二、语言符号二分模式	(9)
(一) 正确理解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	(9)
(二) 对任意性原则的批判	(17)
三、语言符号三分模式：皮尔士语言符号观	(27)
四、索绪尔语言符号学观与皮尔士符号学观的相通之处	(32)
五、索绪尔与皮尔士符号学观差异分析	(41)
六、评语言符号任意说与象似说之争	(50)
(一) 象似说	(51)
(二) 任意说	(53)
(三) 象似说与任意说之争的解构	(55)
七、语言符号性质新论	(62)
(一) 信息时代符号的幻象性	(62)
(二) 符号学视野下的语言模糊性	(67)

第二部分：语言符号意义本体论	(87)
一、意义与语言形式本身：逻辑意义	(87)
(一) 语言形式分析	(87)
(二) 语言互动：英汉借词	(100)
二、意义与语言使用者间的互动：使用者意义	(109)
(一) 语言与身份意义	(109)
(二) 表达情感	(116)
(三) 礼貌用语	(120)
(四) 称谓语研究中的人际关系意义	(125)
三、意义与文化：文化意义	(138)
(一)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138)
(二) 人文与科学精神在广告语言中的意义	(146)
四、语言意义与性别：性别意义	(170)
(一) 汉语和英语中性别歧视概览	(170)
(二) 英语性别歧视透视	(175)
五、意义与语境：语境意义	(182)
(一) 意义与语言语境	(182)
(二) 意义与情境	(185)
六、禁忌、委婉语与意义	(192)
第三部分：语言符号意义实践论	(201)
一、西方语言学理论在我国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201)
(一) 直接法和新语法学派	(201)
(二) 认知法与转换生成语法	(204)
(三) 功能法与社会语言学	(207)
二、环境与外语教学	(210)
(一) 英语小班教学	(210)
(二) 大学英语分班教学	(220)
三、语言形式特征与外语教学	(230)

(一) 结构教学的必要性	(230)
(二) 结构与结构教学	(232)
四、语言使用者认知策略对英语听力的影响	(239)
(一) 调查方法	(239)
(二) 调查结果	(240)
(三) 讨论与启发	(242)
五、语言习得与外语教学	(244)
(一) 我国外语教学的现状、不足之处及其原因	(245)
(二) 母语习得与外语学习理论	(246)
(三) 外语教学措施与实践	(249)
六、语言符号的补充——身势符号	(252)
(一) 身势符号的特点	(253)
(二) 身势符号相对于语言的作用	(256)
(三) 身势符号研究的意义	(257)
七、文本符号的意义解读——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	(258)
(一) 产生的背景意义	(258)
(二) 失落了的人文关怀	(265)
(三)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语言意义理论根源	(271)
第四部分：逼近全方位的意义解读模式——符号与交际	(279)

第一部分：语言符号模式论

一、语言符号意义理论概述

新的时代要求我们传承意义研究的良好传统并开拓全新领域。哪些具有深远意义的意义理论值得我们去重视呢？新的意义研究又会走向何方？让我们一起探索意义运行的轨迹。

（一）上帝的神话与原子主义

众所周知，西方许多学科研究都把源头追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儿，把他们看做是本学科的开山鼻祖。语言符号意义研究也不例外。这两位祖师爷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什么样的奠基性话语？他们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让我们先从柏拉图谈起。虽然柏拉图对西方的主要贡献在哲学思想方面，但他对语言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也作过专门的阐释。柏拉图举的经典的例子是关于“床”的概念。他认为世间存在三种“床”，第一种是属于理念（ideas）的“床”，它是由上帝创造的；第二种是由木匠创造出来的具体的“床”；第三种是作为语言符号的“床”。按照柏拉图的观点，上帝创造的“床”的理念是永恒的真理，而木匠制造的“床”是对上帝理念的模仿，而语言符号“床”是对木匠制造的具体的“床”的模仿。这样一来，语言符号是对真理的模仿的模仿（imitation of imitation），它远离于真知或真理的两倍距离，所以柏拉图得出结论，从语言符号中得出的知识是间接的，因此语言符号与真理本身相比是低级的，他甚至认为理念是人类感官所不可企及的。虽然柏拉图把上帝创造的理念看成是语言符号意义的唯一真正来源，但实际上，所谓“理念”无非是指同类事物的共同特征。柏拉图的

这一语言符号意义模式是西方古老语义三角的雏形。从这一模式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柏拉图的意义模式为后来的语言学家制定了研究框架,也可以说它是整个西方意义理论的基础。毫无疑问,作为三角一端的语言符号本身是历代语言学家的永恒话题,即使到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手里也不例外(实际上在他看来,意义研究中只存在于语言本身,别无他物)。至于另外两角在不同的语言学家眼中则产生了相应的变形、修正甚至消失。关于这一点,下文将详加论述。第二,虽然柏拉图认为语言符号远离理念,但语言符号仍是表征(representation)事物,表达理念的工具。换句话说,词语可以再现事物的本质,我们可以通过语言符号来把握事物。这一观点对19世纪以前的西方语言学家的影响非常深刻,因为在这一阶段中,语言是作为一种再现工具加以研究的。第三,柏拉图将语言意义的终极引向人类感官所不能触及的上帝创造的理念上去,这一观点为唯心主义开辟了先河。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不仅在哲学领域,而且在语义研究领域与其老师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唯物主义路线。亚里士多德断然舍弃了上帝创造的“理念”,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心灵经验,他说,“口语是心灵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只是口语的符号”^①。所谓心灵经验是指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不仅合理继承了柏拉图关于语言符号是事物再现工具的观点,还把经验世界的事物看成是意义的来源,关于这一点,他在《形而上学》中表述得非常清楚:“每一个字必须指示可以理解的某物,每一字只能指示一种事物,决不能指示许多事物。”^②关于语言这种再现功能,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进行了具体的应用。他认为,

① 周建设.西方逻辑语义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9.

② 同上,10.

戏剧家在创作戏剧时利用语言来模仿人和事^①。换言之,语言符号与所指的对象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比如 cat 这个英文单词指称动物“猫”。那么,名称或名词所指的对象是否就是我们所经验到的个体实体呢?亚里士多德认为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他认为“实体有第一性实体和第二性实体两类。第一性实体实质上指事物个体;第二性实体则指事物的类”^②。所谓事物的类指的是该类事物的共同性,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显而易见,亚里士多德的“第二实体”与柏拉图的“理念”有了相似之处。尽管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在哲学上走了不同道路,将语言符号的最终意义归于不同来源,但他们的共同之处不可否认:都认为语言与所指对象之间存在着表现与被表现、指称与被指称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一观点在以后的包括中世纪在内的近两千年中甚为流行,并得到发扬光大。中世纪的许多学者如西班牙的彼得·希雷斯伍得的威廉·萨克森的阿尔伯特以及威廉·奥卡姆等,都对语言的指代性作过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产生这样的局面恐怕离不开《圣经》中语言观的影响,因为根据《圣经》,上帝说,“神说有了光,于是就有了光”,“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等等。“这种《圣经》语言观将语言看成是对于世界的命名,语言与世界等同。”^③这一时期盛行的语言观认为,语言符号是纯粹的工具,人们为了认识事物,用特定的语言符号去指称它们,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存在着逻辑对应关系。这种原子主义语言观直到索绪尔的手里才被打破,而到了德里达手里更是面目全非,他鄙夷地称这种观点为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

语言的牢房与这种语言是意义的载体,语言与所指对象之间

① Aristotle. *The Art of Poet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25.

② 周建设. 西方逻辑语义研究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13.

③ 盛宁. 人文困惑与反思 [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7, 59.

存在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的原子主义工具论针锋相对,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 de Saussure)——现代语言学之父,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语言观。他认为,语言是一个自足自律的封闭系统;它是一种先行的存在,人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只能接受该系统。他进一步将语言系统中的符号分割成两部分:物质部分和观念部分,用索绪尔的术语就是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能指即语言符号的声音或书写记号;而所指则是语言符号指代的概念。索绪尔的所指与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第二性实体”都是指语言符号所指的观念,所不同的是,他们与语言符号的关系出现了根本的变化,索绪尔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不是一目了然的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它们的对应关系完全是人为随意的、约定俗成的,缺乏必然的联系。这就是语言符号的“第一定律”;“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①。比如“谢谢”这个概念与英语中的能指“thank”没有任何内部联系,因为“谢谢”这一能指在其他语言中完全可以用另一符号来表示,如在法语中就成了“merci”。那么语言符号的意义从何而来?索绪尔认为,语言意义来源于语言符号的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意义,他甚至说“在语言中仅存在差异”^②。显而易见,参照古老的语义三角,索绪尔在符号模式中不仅一笔勾销了现实世界,而且淡化了意义的存在。他把意义控制在语言的差异对立之中。索绪尔的这一语义研究方法至少具有两点启示:一是意义在差异对立中产生,这一观点对传统的语言观不啻是一记重击,因为意义不再被认为是人们利用语言符号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语言系统内形式关系的产物。这一观点为结构主义者所普遍接受并加以弘

① F.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London: Peter Owen, Ltd., 1959, 102.

② 同上, 118.

扬。如激进结构主义者叶姆斯列夫(Hjelmslev)认为真正的语言理论应仅讨论语言内部的关系范畴,而不应讨论语言外物质属性^①。结构主义的这种研究方法被美国文化批评学者弗·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斥之为陷入了“语言的牢房”。二是既然语言意义产生于语言符号差异之中,那么决定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例如:狗之所以是狗,乃因为它不是猪,不是鸭,不是床,不是……,这种逻辑方法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埋下了隐患。

(二) 经验世界的回归与人的觉醒

在欧洲符号学创始人索绪尔为反对原子主义工具论语言观而苦心建构结构主义大厦的同时,美国符号学鼻祖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也对语言符号意义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主张。皮尔士将语言符号放在更大的符号学范畴内加以讨论。他曾举出10种基本的有关符号区别的三分系统,在这些三分系统中只有三套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它们都以“符号——对象——解释项”三项式为基础。不难看出,皮尔士把符号看做是一种三角形关系,由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和解释关联物组成。皮尔士的符号模式使语义研究冲出了“语言的牢房”,与索绪尔的语言意义模式相比,其突出的历史贡献在于:第一,索绪尔的语义研究基本上局限在封闭的语言系统内部,而皮尔士语义研究则冲破了语言界限,比如对非语言的肖似符号的研究;第二,索绪尔的语义模式一笔勾销了客观世界的存在。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物质决定意识,如果没有了客观世界的存在,属于意识范畴的意义不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吗?意识到这一点,皮尔士毅然地把客观对象拉回到意义三角中;第三,虽然客观对象被拉回来了,但此时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已与一一对应的原子主义工具论有了本质的区别。原子主义认为二者间应是必然的客观存在的关系,但皮尔士

① G. Sampson. *Schools of Linguistics* [M]. London: Hutchinson, 1980, 167.

则把这二者间的关系建立在“解释项”的基础上。而对事物的解释则会掺进不同人的主观因素,假如我们参照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这一点则不难理解,因为实用主义认为,只有符合自己主观利益的解释才是有用的,再者,与索绪尔关于能指和所指是先天存在的超验语言系统观相对立,皮尔士对语义研究最明显的历史进步在于:增加了“解释项”,体现出人的主观因素,避开了纯客观的演绎。同样将经验世界的对象和人的意识纳入语义研究的还有奥格登(Ogden)和理查德(Richard)。他们勾勒出一个著名的语义三角形^①。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语言涉及三个元素:语言元素(symbol)、所指物(referent)和概念(concept)。语言元素指称所指物,不是像逻辑中心主义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的,而是通过说话者头脑中与该语言形式相关的概念(concept)实现的。人们在认识过程中把外部世界概念化,而这些概念的含义又在交流中被约定俗成下来,从而充当了语言元素与所指物的中介。这一概念便成了词的意义。虽然这一语义三角中的概念(concept)与索绪尔所说的所指(signified)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却又有本质的区别:后者的所指是一个先验存在的意义系统,等待同样是超验的语言形式系统的切分;而前者的概念则是人们后天对世界的概念化和知识化,其描述对象是客观世界,而应用手段则是语言元素。这样一来,这一语义三角形便集中突出了人利用语言的能动建构性,而并非是被动的。将人的意识或心理过程应用于语义研究的还有美国的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其出发点是“刺激—反应”交际模式,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加论述了。这一部分讨论的语义研究者都把经验世界的客观实在和人的意识纳入到语义研究模式中,也许是由于此前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因为

^① Ogden, C. K. & I. A. Richard. *The Meaning of Meaning* [M]. London: Longman, 1923, 11.

前者把客观实在看做是认识的基础,而后者则把人的精神世界首次暴露无遗地呈现在人的眼前。

、(三) 意义危机

西方语义研究刚刚跳出索绪尔构建的语言牢房,但好景不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直到20世纪末的几十年里,却又不幸陷入德里达倡导的“解构主义”泥坑之中。其实,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观点直接来源于索绪尔开辟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如在德里达的书中常常保留了不少索绪尔的关键术语如“差别”(difference)、“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等等,但更重要的是德里达篡改了索绪尔的主要观点。上文提到索绪尔否定区分逻辑的语言意义理论为解构主义的极端立场开了绿灯,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德里达私自将索绪尔的封闭语言系统打开了,因而要得到单词“dog”的概念,就必须参照英语中的其他成分,因为能指“dog”不是“cat”,不是“pig”,不是……,按照这一逻辑,语言成分对他项的参照因为语言系统被打破也就变得没有止境。从理论上说,寻求与能指符号相对应的“所指”,便只能是以一个新的能指符号去代替有待解释的能指符号的过程,一个由一种“能指”滑入另一种“能指”的永无止境的倒退过程。正因为如此,德里达将时间观念引入语言符号解释过程,认为索绪尔的差别(difference)区别原则不足以界别符号的意义,他硬是生造出一个“延异”(différance)的概念,并应用于语言意义的解释过程中。即每个语言成分的意义必须到差别和延缓的网络中寻找。因此,德里达从以下几个方面使语义研究失去了任何意义:第一,客观实体和经验世界与意义毫无联系,因为德里达语义模式追求的意义只能在没有终点的符号链中兜圈子;第二,意义本身已不复存在,因为语言符号组成的网络是个开放的系统,差异区别过程永无止境;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超越区分符号的时空运动的终极意义;第三,在索绪尔看来是有规律可循并可对立切分的封闭系统内的语言符号,到了德里达

手中,便陷入了没有终结的语言游戏之中。由于上述两条理由,这一语言游戏已成了无稽之谈。虽然德里达理论的根基是语义模式的研究,但其影响却遍及文学批评与哲学领域,进而被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所采用,并与新实用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结合,从而造就了当今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太观。这一现象的形成恐怕离不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给人们带来的信仰危机。

(四) 新语义研究展望

其实,德里达的语义解构理论的矛盾之处显而易见,因为按照其观点,意义的产生和传送失落在语言符号游戏之中,那么他著书立说的目的难道不是向读者传播其解构主义主张吗?道理虽然明了,但批倒解构主义却需要强有力的武器。经典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武器,因为它非常重视现实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解构主义理论中缺席的一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没有物质就没有意识。语言符号内部成分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区分关系,但本质上,语言符号的意义是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非来源于先天存在的语言系统。也就是说,人们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周围的环境接触,然后利用语言建构自己对所接触事物的感觉经验和知觉经验。所以,语言符号的意义来自我们对指称对象的知觉特征的抽象和总结。由此看来,在新世纪,解构主义将不断地受到批判,特别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这是新意义研究可能出现的第一个趋势。第二个趋势是意义研究的多元性。随着宏大叙述(或理论)被解构主义解构,西方学术界再也不会出现原子主义工具论在中世纪一统天下的局面。学术中心被打破,被许多后现代主义称为“弱势”的话语挤向前台,纷纷亮相,各个派别各抒己见,真正达到“百花齐放”的局面。第三个趋势是各种意义理论相互接触,相互碰撞,就不同观点不断对话协商以期达到一定的共识。实际上,没有共识,就没有对话的基础。从

某种程度上说,语言符号的意义就是一定范围的不同主体就他们共同生活的世界中的事物、现象及经验知觉所达成的共识。语言意义产生于人们的话语活动,意义不是语言天生就有的,而是人们的生活经验、心理认知及为了生存的需要而与外界、他人、社会进行不断磋商交流的结果。

二、语言符号二分模式

(一) 正确理解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认为,任意性是语言的第一原则。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这一原则的讨论相当激烈,有人提出质疑,甚至完全否定现代语言学的根基——任意性。究其原因,是由许多学者对语言任意性原则产生的一系列误解所致。任意性原则是索绪尔语言学观的核心内容,贯穿于《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不仅存在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中,还存在于能指之间、所指之间以及其他更大的语言层次结构上。我们将逐个澄清关于语言任意性的误解,从而唤起对这一原则的全面正确的理解。

索绪尔的观点主要收集在由他两位学生在他去世后根据听课笔记整理而成的重要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在这本书中,索绪尔提出了语言符号的第一特征,也是该书的核心思想——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联系是任意的(arbitrary),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sign)是能指和所指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①其中,能指代替音响形象,所指代替意义。索绪尔举例说“sister”一词的意义与法语单词能指“s-o-s”之间并没有内在联系;这个意义在

^①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102-103.